

## 中国文化观念的条理脉络和精神结构

(上接第9版)

君子人格是含藏极为丰富的美称,并非要求每个被称为君子的人都能得其全体,但有一些关键选项不可或缺。有一次,司马牛问如何才是君子,孔子说: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随后又说:“君子之道者三”,“仁者不忧,知者不惑,勇者不惧”(《宪问》)。讲的又是知仁勇。但与前引不同的是,不再用“近乎知”“近乎仁”“近乎勇”了,而是直接以“仁者”“知者”“勇者”标称。就是说,已经达到了、具备了智仁勇的品德,这是成君子之德的重要标志。还有一次孔子对子产说:“有君子之道四焉:其行己也恭,其事上也敬,其养民也惠,其使民也义。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“恭”,就是敬,亦即孔子回答“子路问君子”时讲的“修己以敬”(《宪问》)。对待民众,君子应该抱持的态度,一是要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,二是不要以力和势对待民众,而是要讲道义。这些,都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格。《论语》末章最后一句话: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也。”(《尧曰》),即尤为紧要,君子各种品格的归因就在于此,说来话长,此义不能在此多具。

修身的第三境界,是能够成为圣人,这是历来儒者的最高理想。孟子称圣人为“人伦之至”(《离娄上》),如果以之为标准,孔子自然当得圣人称号。但孔子本人雅不情愿,他说:“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,得见君子者,斯可矣。”又说:“若圣与仁,则吾岂敢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孟子还说周公是“古圣人也”(《公孙丑下》),此说孔子自必认可。除此之外,孟子还说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也都是圣人。至于他自己,这位以好辩自居,“欲正人心,息邪说,距跛行,放淫辞”的孟夫子不无谦逊地说:他属于“圣人之一徒”(《滕文公下》),即以圣人之一。后世称孟子为“亚圣”,看来不是没有缘由。汉以后,从《史》《汉》两书的叙事看,圣人的称呼似乎有所放宽,而且有从“人伦之至”的德称向“德位兼之”的位称的趋向,很多三代以来的创制者、成大业者或成一代之天下者,都不免以圣人、圣王称之了。

古之圣者远矣,后来者不管达到达不到,几千年来儒者的圣人理想和圣人情结,一直高悬在那里。当然,无论是修以成人,修以成德,还是修以成圣,最终还须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大任。“成人”“成德”“成

圣”,都不是成一己之私,而是成天下之大公。《礼记·大学》阐释“大学之道”,以“明明德”“新民”(“亲民”应为“新民”之误)“止于至善”为“三纲领”,实际是对修身所要达致的目标的一种规约。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是“大学之道”的“八条目”,不妨看做是修身的行进次第。“八条目”可以正推,也可以反推。我们先看“反推”: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;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,致知在格物。

正推是:

物格而后知致,知致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正推的“八条目”可以简称为格、致、正、诚、修、齐、治、平。反推可以简称为平、治、齐、修、诚、正、致、格。正推也好,反推也好,连同“三纲领”“八条目”本身,都是研究者为了方便的一种简洁约称。无论正推还是反推,“修身”都处于“八条目”的中间转折点。所以《大学》还提出: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兹可知“修身”在中国文化观念中的地位。此分部的首篇为“君子篇”,其余顺序为忠恕篇、仁爱篇、知耻篇、义利篇、知行篇,内在组合逻辑相当紧密。

### 问学

第六分部“问学:通经致用”,是对中国文化观念中的“道问学”部分给以分梳。《礼记·中庸》有言:“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。致广大而尽精微。极高明而道中庸。温故而知新,敦厚以崇礼。是故居上不骄,为下不倍,国有道,其言足以兴,国无道,其默足以容。”则德性之修与学问之知从来是“成人”的两个支点,不可有一无二。《中庸》又云: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。”以此,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,是为学的五个环节。学问一词,问学也有问,学而有疑,不能不问,而问必资于学。孔子说: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”(《为政》)则学与思不能分离。但思须学而后思,不学而废寝忘食终日思之,亦无益也(《论

语·卫灵公》)。《周易》乾卦之“文言”又云:“君子学以聚之,问以辩之,宽以居之,仁以行之。”“辩”义自是切磋讨论,也可以理解为问义的延伸,即问之又问。“宽”者,指学者心胸和为学之路。鄙吝、局促与学无关;私智、小巧也不能成其大。学的终究是“归仁”而仁的关键,在于“力行”,亦即“仁以行之”。故夫子高弟子夏说:“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思,仁在其中矣。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儒之圣者马一浮总结得更为完备,他写道:

从来说性德者,举一全该则曰仁,开而为三即智、仁、勇也,开而为三则为知、仁、勇,开而为四则为仁、义、礼、知,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,开而为六则并知、仁、圣、义、中、和而为六德。就其真实无妄言之,则曰“至诚”。就其理之至极言之,则曰“至善”。(《泰和会语》)

马先生标举的“性德”,也可以理解为“成德”之性,其全体大用则为仁。所谓“六德”者,系《周礼·地官·司徒》规制之“以乡三物教万民”之一种,包括“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”,是为“六德”(《周礼注疏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,第266页)。《中庸》论修身提出的“达德”,与性德具有同义内涵,因此“开而为三”即智、仁、勇也。随后,马先生又引《中庸》“至诚”之说暨《大学》“止于至善”之道,与“全体大用”之“仁”联系起来。盖“至善”与“至善”可视性德之别称,诚者必善,善者能仁。就学问而言,“至诚”是学者必须有的精神维度,学而不诚会导致虚妄。而“至善”则是学问的终了的结果。

学问学问,同学问学,其真谛原本在此。

本分部由经学篇、小学篇、义理篇、辞章篇、诗教篇、英才篇组成。中国传统学问以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,而以经学居其首。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就是通常所说的“六经”,但开始并不以“经”称,而是称为“六艺”。故太史公说: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,弟子盖三千焉,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又说:“自天子王侯,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,可谓至圣矣。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汉以后称六艺为六经的情况多有,但仍不及单提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者多。

研究经学,本经最重要。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是经学的本经或曰原经,是中国文化原初的文本经典,是中国学术最早的思想

源头。马一浮说:“学者当知六艺之教,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,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,放之四海而皆准,所以至高;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瞭解,百姓日用而不知,所以特殊。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,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,单独的发抒自己民族精神而止,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,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,而复其本然之善,全其性德之真,方是成己成物,尽己之性,尽人之性,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。”(《泰和会语》)以此本分部之《经学篇》,主要以六经为主,且以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作为研究取样,而不旁涉经学史等其他问题。小学是经学的人阶,由小学进入经学,能得经学之正。本分部的《小学篇》主要以《尔雅》为案例,期有举一而三反之效云尔。

清代学者戴东原说:“古今学问之途,其大致有三:或事于理义,或事于制数,或事于文章。”(《戴震与方希原书》,《戴震集》上编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,第189页)戴氏是三者都能得其源者。但就大多数学者而言,义理、考据、辞章,或长于此而短于彼,或长于彼而短于此,三者能得其全者少之又少。此即刘开几所说:“史有三长:才、学、识。世罕兼之。”才即辞章之源,学为考核之源,识为义理之源。理想的学问境界是三者合一,故《文史通义》作者章学诚写道:“理不可空言也,博学以实之,文章以达之,三者合一,庶几载周、孔之道虽远,不啻累译而通矣。”(《文史通义·原道下》)此一题义关乎学问的成全方式和行迹途径,故本分部有《义理篇》和《辞章篇》之设。

本分部的《诗教篇》和《英才篇》,意在明问学与造士的关系。《礼记·王制》云:“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,曰俊士。升于司徒者,不征于乡,升于学者,不征于司徒,曰造士。”又说:“乐正崇四木,立四教,顺先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以造士。”春秋教以《礼》《乐》,冬夏教以《诗》《书》。王太子、王子、群后之太子、卿大夫元士之适子,国之俊选,皆造焉。”此可见三代之造士是何等重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。“造士”一词,尤堪玩味。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六艺经典,恰好是造士的教科书。又孟子有言曰:“君子有三乐,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父母俱存,兄弟无故,一乐也;仰不愧于天,俯不忤于人,二乐也;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,三乐也。”(《尽心上》)孟子崇蒙太,宜乎提倡精英教育。则

此《诗教篇》《英才篇》之设,亦不无原典之凭矣。

### 人物

第七分部“人物:生息与风采”,是中国文化观念系列的一组特殊景致。此盖由于中国文化历来有赏鉴人物、品评人物、月旦人物的传统,此风以三国魏晋为最盛。据《后汉书》本传记载,汝南人许劭、李膺“共有高名”,喜欢“核论乡党人物,每月辄更其品题”,致汝南有“月旦评”的品人风俗。又范阳人张华字茂先,性好人物,哪怕是贫贱的看门人,只要一介之善,“便咨嗟称咏,为之延誉”(《晋书》卷三十六)。三国时吴国的易学家虞翻,有“美宝”之称,孔融读其《易注》,叹为“东南之美者”。孔融引荐祢衡,荐词写得尤令人绝倒,试看其精言美句:

窃见处士平原祢衡,年二十四,字正平,淑质贞亮,英才卓犖。初涉艺文,升堂睹奥。目所一见,辄诵于口;耳所闻,不忘于心。性与道合,思若神。弘羊潜计,安世默识,以衡准之,诚不足怪。忠果正直,志怀霜雪。见善若惊,嫉恶若仇。任侠抗行,史鱼厉节,殆无以过也。鸷鸟累百,不如一鹗。使衡立朝,必有可观。飞辩骋辞,溢气壅涌,解疑释结,临敌有余。昔贾谊求试属国,诡系单于;终军欲以长缨,牵致劲越。弱冠慷慨,前世美之。近日路粹、严象,亦用异才,擢拜台郎,衡宜与为比。如得龙跃天衢,振翼云汉,扬声紫微,垂光虹蜺,足以昭近署之多士,增四门之穆穆。钧天广乐,必有奇丽之观;帝室皇居,必蓄非常之宝。若衡等辈,不可多得。(《后汉书·祢衡传》)

盖只有魏晋人如此宝爱人物,力荐不遗余力,揄扬不惜其美辞妙语,至其荐举结果如何,并不汲汲于心。山涛担任选职十有余年,每一官缺,都拟出备选名录,并对“甄拔人物,各为题目,时称‘山公启事’”。时代风气使然,故有奇书《人物志》的出现。作者刘劭原为一计吏,后来做考课官,竟撰写了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”,为史上所仅见。《人物志》则是一部专门研究人物品鉴的大著述,被人视为经典。《世说新语》更是众所周知的魏晋人物风采大经。此第七分部以“人物:生息与风采”为题,良有以也。

人物的资质本乎性情,故本分部在《人物篇》之后,接以《性情

篇》。历史上凡与艺术相关的人物,大都是性情中人。此即《红楼梦》所说的“间气所钟”之人。本分部的《童心篇》主要状写明末的奇人李卓吾,他的“童心说”的提出为明清思想转型开出一新生命。童心是人性的回归,是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精神源泉。《狂狷篇》亦复如是,此不多赘。《丹青篇》是画家阐发画理,旨在研究中国诗、书、画的艺术美学构成。最后的《田园篇》,不是要进入陶渊明的思想艺术世界,而是把“田园”看做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,探讨历来的中国艺术精英,亦即《红楼梦》所谓“间气所钟”的一流人物,何以有时会田园作为自己的生命归宿。

现在,《中国文化观念通论》即将付梓。此项研究的著述体例,不无开辟创制之功,迄今为止尚未见前修时彦有同类著作出版。惟其如此,其不成熟之处自必多有。况各撰稿人之才性学养难齐,行文风格亦未能完全统一。虽历经年所,修改至再,仍不敢断言没有舛误留存。谨敬请明学知类之君子不吝赐正。感谢中国文化研究所众学士的参与,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对此项课题的支持,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为此书之出版付出的辛劳。论曰:

大哉中国,人文化成,往圣昔贤,玉振金声。威威昊天,惟道是从,本末始终,大易流行。天何言哉,万物资生,人心天心,感而遂通。至哉人伦,有纲有绳,四维不坠,家国何倾。譬如北辰,为政为公,治而无为,天下太平。修身以德,成人成圣,好学近知,知耻近勇。仁者不忧,恕以为庭,怀德君子,立身知命。六艺典藏,学者所宗,雅志微言,圣人之情。观心洞府,文化祖经,典辞妙喻,幽赞神明。华夏人物,显乎性情,狂者进取,狷者独行。田园归乎,童心若婴,统才绝艺,间气所钟。统分七部,知类能明,章有闕二,撮要撮英。斯也通论,诤而难通,敬请师友,不吝赐正。

2021年7月18日写于京城之东塾

## “唐代文学不妨多维看待”——读陈尚君《诗唱大唐》

■韩凤冉

篇文章为《唐朝皇帝的诗歌》和《唐朝皇帝点赞过唐诗》,前者介绍唐朝皇帝的诗歌创作,后者介绍唐朝皇帝对诗歌的阅读与鉴赏。

作者通过统计发现,有唐二十一帝中,大多数都有诗歌留存至今,李唐皇室堪称唐代第一文学家族。作者择其杰出者,包括玄宗、太宗、昭宗等十人,以诗歌造诣高下为其排了座次,并作品评。如玄宗酷爱作诗,他任宰相会写诗,送别巡边会写诗,逢时节庆会写诗,有所感慨会写诗,还经常要求满朝大臣一起应和。可以说,盛唐诗歌空前繁荣,玄宗是一位重要的推动者。其现存诗百余首,主体是靠《张说文集》的附录而得保存。《经部鲁祭孔子而咏之》一篇曾入选《唐诗三百首》,就诗歌的艺术成就来说,他在唐代皇帝中不愧为第一。

通过对唐朝重臣郭元振行状的了解,作者为我们展示了武后提携郭元振的背后,就与阅读欣赏其诗作《古剑歌》相关。这首诗每句

都写剑,每句也都写自己之英雄抱负,期待能为世用。武后“览而佳之”,竭力提拔,渐次擢授凉州都督,到中宗时任安西大都护,守边十余年,四镇宁谧,为一代名将。

书中还讲述了状元、僧人、儿童等各个社会阶层与诗歌的关系,作者让文学与历史再次回到同一时空,帮助读者更深刻地读懂诗人的心声,引起更多心灵上的共鸣。其中最精彩的一篇当属《大唐王朝的第200年》。

该文展示了元和十二年这一年中,唐朝文人志士为拯救唐王朝的衰微而进行的种种努力,其中尤以裴度主持平定淮西叛乱为代表。裴度立排众议,任人得当,组织有力,将帅一心,终于凭借李愬雪夜袭蔡州,而一举平定吴元济淮西之乱。这是中唐时期朝廷对藩镇取得的重大胜利。作者在历史叙述中穿插了大量当时人的相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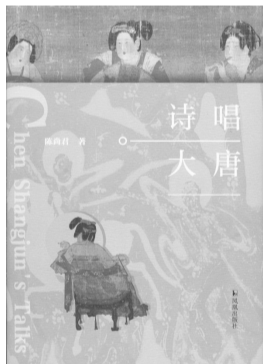
诗作,使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当时历史人物的情感,如王建为裴度东征所作的《东征行》:“相国动日波涛清,当朝自请东南征。”“噙白口当南山,不立功名终不还。”裴度还在此行任命韩愈为行军司马。韩愈在争取淮西都统韩弘的过程中所作的《过鸿沟》:“龙疲虎困川原,亿万苍生性命存。谁劝君王回马首,真成一掷赌乾坤。”可见其对自己所负责任的清醒认识。裴度在行军途中也有“待平贼垒报天书,莫指仙山示武夫”的诗句,势在必胜之决心,跃然可见。

淮西大捷之后,很多文人都撰写祝贺诗,表达对这一重大胜利的欣喜之情,其中以刘禹锡撰写的《平蔡州三首》,柳宗元撰写的《平淮夷雅二篇》为代表。作者结合诗人此时所处的环境进行解读,展示了不同人生境遇下的情感表达。这些都被大加添了读者对诗作、诗人和历史的认识。

因此事而诞生的韩愈名篇《平淮西碑》,更是无法回避的话题。

围绕此碑的刻立和磨除,文学史上早已众说纷纭。作者则另辟蹊径,从政治角度出发,认为立碑倒碑其实都出于宪宗之态度,对裴度是提防,对韩愈则有积怨。宪宗任命风评一般的皇甫镈、程异为相,来分裴度之权,显示出裴度为国立功后,宪宗并不希望他的权势进一步扩张。不久宪宗去世,大唐王朝的中兴希望也就此戛然而止。诚如作者所说:“元和十二年是唐王朝漫长历史中偶然的一页,大风巨浪中,君臣奋力,各骋长才,取得巨大的成就,成为王朝中兴的标志年。诗人们也在时代的浮沉中,贡献自己的力量,吟唱人生的悲喜。读懂时代,也就读懂了他们的心声。”

作者能够撰写出如此富有才情、深入浅出、娓娓道来的篇章,其背后的支撑来自于作者丰富的学术经历和深厚的学术素养。作者多年来致力于唐代诗歌文献考订,近十年来更全力以赴作全部唐诗之考订与写定,熟悉敦煌写本、碑刻铭文、域外文献等各类史料,



《诗唱大唐》,陈尚君著,凤凰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,68.00元

在文献占有上具有独特优势。作者认为“文学史书写与作家作品论构成近七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之主流,到近年观念转变,有许多新的热点”,主张“唐代文学亦不妨多维看待”,本书正是作者将其学术理念付诸实践。作者一直秉持文史融通治学理念,认为古代社会与文学本是浑然一体,主张将诗歌置于唐代整个历史背景中予以观照。这些学术理念,在书中都有所体现。因此,本书在给读者带来美妙阅读享受的同时,也予学界同仁以研究方法上的启发。

## 日历里的掌故 舌尖上的民俗

■仲富兰

六绝句》),也是越来越有味道了,闲情雅趣,都在笔墨之间,画出了世俗生活、人间烟火中的趣味雅意,保留了人们心里的小确幸、小美好。

这一版日历的特色,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条目涉及饮食,理由很简单,民以食为天嘛。中国人的餐饮之道,历来充满了奇思妙想。只要看一一下近世以来的文章大家,那些市井乡间的掌故逸闻、名人趣事,乃至菜肴烹制过程中的刀工技艺、香烟火候,海阔天空,纵横八荒。他们不仅是文章高手,本身也是老资格的“饕餮”。有的文章看似跑题,然而趣味就在这些东拉西扯的

闲谈之中,各种文思与妙想浸淫其中,如“四鲟鲈鱼”的故事,在外做客的张翰因为思家学鲈鱼莼羹而辞官,于是中国文学中多了一个“莼鲈之思”的典故。实际上美食只是引子,真正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一个离家游子对于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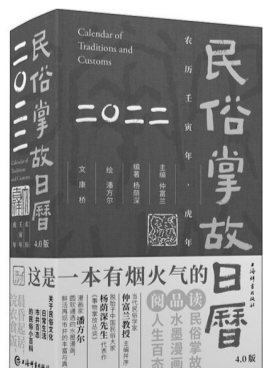
江南吴地的地方菜,终年迭替不断,烹制技巧精湛,尤其是时令与菜肴,逢熟吃熟的风俗,进一步提升了民俗掌故日历内容的丰富性、趣味性和可读性。如书里提到的各地饮食习俗,类似“三烧五腊九时鲜”“岳飞茶”“擂茶”“澄城面

花”“撑腰糕”等,听名称就能感觉到菜名背后的文化积淀。譬如“三烧官的五腊九时鲜”是旧时汉族民间立夏节令物的总称,流行于杭州等地区。“三烧”是指烧饼、烧鸭、烧酒;“五腊”是指黄鱼、腊肉、咸蛋、螺蛳、一个离家的游子对于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恋。

中国的饮食起源于农耕文化,以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为中心。

随着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融,人们饮食的种类与结构更丰富。明清海域的开拓,又将番薯、马铃薯、玉米、番茄、辣椒等外来作物引进国门,不但解决了中国自古以来缺粮的问题,还丰富了人们的餐桌。近世以来,西方饮食理念与方式逐步得到国人的认同,逐渐演变为一种带有新时代风格与文化风尚的饮食形态。

美食是深植人心的家乡味道,承载了民族的记忆和生活方式。一年365天,每日三餐;365个掌故置于案头,每日一翻。窥一斑而知全豹,从这本日历书中,我们不仅感受到中国



《民俗掌故日历4.0版(2022)》,杨荫深著,仲富兰编,潘方绘,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,98.00元

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,更能从中领略到丰富多彩的民俗民风、世相百态和生机勃勃的市井烟火气息。